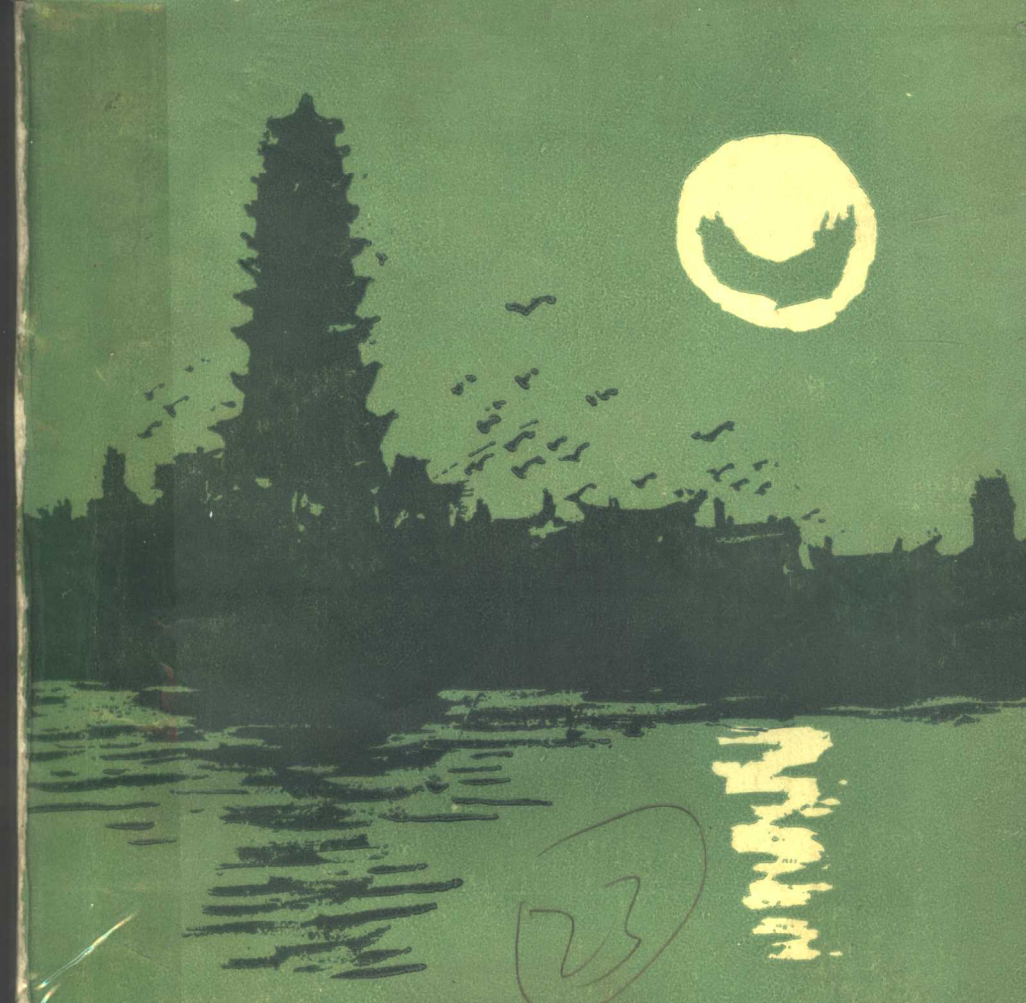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 编著

太湖地区农业史稿

农业出版社

太湖地区农业史稿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南京农业大学

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 编著

农业出版社

太湖地区农业史稿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南京农业大学

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 编著

* * *

责任编辑 穆样桐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区枣营路)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32开本 15.5印张 37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10册 定价 15.20 元

ISBN 7-109-01318-9/S · 941

前 言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常常有人把长江称之为“黄金水道”，把长江三角洲称之为“金三角”。如果这一比拟可以成立，那么，太湖地区，则是镶嵌在黄金水道尾间和金三角上的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

太湖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条件优越，近代经济发展较早，城市、集镇众多，物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充裕，居民文化、技术水平较高，所以，这块面积不大的土地，却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太湖地区的土地面积，占我国全国总面积的不到0.4%，人口的比数要高些，但也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7%左右。可是，就以1984年的统计，其年太湖地区工农业产值总计达1355.31亿元，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2.8%；是我国工业和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太湖地区不只现在经济发达，它也是我国较早有人类居住和较早从事农业和畜牧的地区之一。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知，这一地区发现的最早史前文化，是江苏吴县距今有10000年的旧石器晚期的“三山文化”；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或农业文化，是浙江桐乡距今约7000年的罗家角马家浜文化遗址。罗家角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水稻遗存，仅T120的探方中，就发现可供鉴定的稻谷156粒，其中属籼稻的为101粒，粳稻为55粒（占总数的35.3%）。一般认为，粳稻是由籼稻演化选育出来的，从这点来看，太湖地区种植水稻或出现农业的时间，在此之前，当就已有很长的时间。

太湖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虽早，但在上古的一个很长时期，

直到西汉司马迁的笔下，却仍然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和“火耕而水耨”的一幅荒僻落后的景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地广人希”的关系；自然条件虽然优越，但人口、劳力很少，没有也无力充分开发和利用。

太湖地区的开发，主要是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即史学界一般所说的“六朝”时期兴盛起来的。在东汉末年，由于政局混乱、匈奴入侵，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向江淮以南的流散。在这一时期，西晋末年又出现一次永嘉之乱，晋室被迫南迁建康，中原士族和难民，也随之大批逃亡江南；如当时京口（今江苏镇江）和毗陵（常州），即是当时全国侨置州县最多的地区。其后东晋和南朝时，北方长时处在少数民族的入侵和割据之中，继续不断有流民移居江南。因此，南方特别是江东，从黄河流域迁来了大批士族和劳动人民，也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偏安江南的统治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和增加剥削，逃难来到这里的流民要立足和生存，于是，出现了大规模开发江南的需要和形势；因而太湖地区的农业和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迅速和显著的发展。如《宋书》记载：“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数年中，无风尘之惊，……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由汉时的“火耕水耨”和“多贫无积聚”的状况，变成了“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①的局面。这也就是说，太湖地区由贫穷变为富裕，由落后变为先进，也即开始和奠基于这一阶段。

隋、唐，是我国封建时期，继秦、汉以后第二次长期统一和获得空前繁荣的重要时期。如果说太湖地区经六朝的发展，至南朝后期，其农业和经济的生产技术，达到和接近黄河中下游水平，那么，至唐中期以后，经隋和唐朝前期的发展，其经济的众

^① 《晋书·食货志》。

多方面，特别是在农业上，就开创了全面超越黄河流域的崭新局面。这一点，正如唐宪宗在元和十四年（819）的敕书中所说：“天宝以后，……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而韩愈更具体为“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①。关于“江南居十九”的概念，明人邱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又进一步称“浙东西”，又占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5府，又居两浙之十九。上述这些说法，和著名诗人白居易“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的话，如出一辙。所有这些，一致表明天宝以后，我国财赋的重点，或者说“全国经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南，而太湖地区，则成了全国经济重心的重心。

在古代，农业是整个社会决定性的经济部门。在唐朝以后，太湖地区之所以变成全国的文化之邦，甲富之地，主要是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的结果。因为，农业的发展，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文化科技等各种社会事业；也即对其他各业有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当然，反过来，其他事业的共同发展，对农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太湖地区唐以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就是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等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不断交替上升的。

举例来说，如我国千百年来长期流传的“天上天堂，地上苏杭”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讲的是太湖地区两个最大城市——苏州、杭州的美丽、繁华和富庶。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城市实际上也反映整个太湖地区的繁华、富庶，这种情况的出现和这一带盛产稻米、茶叶、丝茧，元以后还有棉花和其他各种农副产品所分不开的。

先以水稻生产来说，在我国史籍中，常可见到“国以民为恃”，“民以食为天”之说。古时所以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商业称为“末业”，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如上所说，太湖地区饭稻羹

^① 《全唐文》卷555。

鱼，自有农业，即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一地区的水稻生产，经六朝的大力开发，隋朝大运河江南段的建设，唐初所谓“贞观之治”的发展，至唐朝中期，不只“家给人足”，“国用所仰”，对全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也愈来愈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如唐宪宗时，李肇在《国史补》中就提到：“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载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由上可以清楚看出，太湖地区由每年交纳大量的稻谷，同时变成了整个东南漕粮和货物的转运、集散中心。因此，一些城市，如杭州、苏州、湖州和常州，进一步繁荣起来。杭州在唐朝以前，其地位不如会稽（今浙江绍兴）为著，唐以后因漕运和商业的兴起，其地位就渐渐超过了会稽，以致五代吴越和南宋，相继以杭州作为都城。其实，太湖地区水稻对全区经济的影响，决不就表现为这些细微方面，而是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其决定的意义。因为在古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脱离农业的人数，是与这个国家或地区农业能够提供的粮食和其他食物面定的。所以，唐朝以后太湖地区的欣欣向荣，都是与这一地区的粮食，首先是水稻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

再如蚕桑，这也是太湖地区史前即有的古老生产事业。我国古籍中称：“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在未有棉花之前，我国衣着的原料，一般人穿麻布，在太湖地区还有一种葛布，长者和富人才衣丝着绸。因为丝织品比麻葛织物要贵，所以，蚕丝的生产和利用，不仅受它自身还受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如太湖地区史前蚕桑生产的历史，并不比黄河流域迟或逊色，但在进入文明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因为黄河流域经济比较发达，所以我国蚕桑的重点，也一直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但自安史之乱以后，随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太湖地区的经济，一跃雄居全国之首，其蚕桑也随之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我国最为发达的主要蚕区。在古代，养蚕成茧，蚕农一般都接着缫丝织

绸，然后送到近处草市出售，再汇集到杭州、苏州等州城府治进一步运销各地。中唐以后太湖地区蚕桑的这种发展，既对农村和农民是增添了一种副业和财源，同时对这一地区的贸易，也增加了一种商品。所以，其对这一时期苏、杭等城和整个太湖地区的富庶和繁荣，也有极其重要作用的。

在唐朝中期以后，对太湖地区经济和文明建设另一起到重大作用的作物，是茶叶。如所周知，我国是茶的故乡，在唐朝以前，饮茶和业茶，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唐朝开元年间，北方大兴禅教，坐禅夜不夕食，只许饮茶，由自北方饮茶就相效成俗。北方饮茶的风盛，促进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蓬勃发展；太湖地区擅运河水陆运输之便，其茶业较其他地区尤有发展。如肃宗和代宗期间，在湖州和常州相界的顾渚，就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贡焙”，专门为宫廷采办御茶。顾渚的茶叶，在六朝时便已有名，唐朝中期被列为贡茶以后，伯仲蒙顶，名满全国，全区及邻近的浙东和皖南的茶叶生产与贸易，一下都较快地发展起来。如晚唐诗人杜牧在《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中吟：“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茶山在宜兴，由诗中可以看出，水口在这时，由茶叶的贸易，已形成有酒楼、客店等建筑的固定集市。再如许浑在《送人归吴兴》的诗中，也有“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的诗句。“茶樯”，就是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的桅杆；由此可以看出，在唐朝后期，太湖地区因茶叶贸易，不仅在茶区出现了一批固定的草市，在一些交通要会之地，还出现了一批转运和集散茶叶的码头、街集；而所有这些，也突出说明这时茶业的发展，不仅较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城乡经济，还进一步促进了山区经济的某些发展。

当然，这里也应指出，这时太湖地区的农业，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上面所说的水稻、蚕桑和茶叶对太湖地区经济繁荣的关

系与作用，仅是举例或作为代表。其实，这时太湖地区农业的各部门之间，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下面还可以畜牧中的湖羊发展为例：湖羊，早前也称“胡羊”，是北宋以前由蒙古绵羊培育而成的一个太湖地区的著名羊种。湖羊最喜好吃食桑叶，其饲料，旧时桑叶要占一半以上，另一半为青草、糠麸之类。其次，湖羊的粪秽，又是很好的肥料，故这一地区在很早以前，就有“猪田羊地”的谚语；表明群众习惯上喜欢用猪粪来肥稻，用羊粪来壅桑、培茶和壅杂粮。通过这些饲料和肥料关系不难看出，养羊和蚕桑、水稻、种茶，都有一定联系。特别是与蚕桑，不但是相互提供饲料、肥料的关系，因为在古代条件下，养蚕和蚕病防治技术都不高，年间蚕的成茧和用桑数量也不稳定，多种一些桑树，蚕季养蚕，不蚕和少蚕时用桑叶喂羊，这样既提高了桑的利用率，又可弥补一部分病蚕、死蚕的损失。所以，《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把畜羊，称之为“树桑之本”，以致把饲养湖羊，看作是蚕桑的一个部分或保证。上面讲的是湖羊与其他农业部门的情况，畜牧的猪、牛、鸡、鸭以及各个农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大都也和羊的情况一样，是一种互为条件、互补互荣的关系。因此，上面所说的太湖地区水稻、蚕桑和茶叶对这一地区唐宋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也应该看成是整个农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唐朝中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太湖地区的开始甲富全国，不仅进一步带来了城市、集镇的繁荣和发展，也促使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大批剥削阶级，更加奢华。有些豪绅富宦，利用手中剥削来的巨额钱财，斗奇比富，莳花种草，精心营建园林、邸宅，以极力追求其安富尊荣的享乐生活。而这些发展，又使苏州、杭州等城的园林、湖山更加妖娆妩媚；苏、杭和整个太湖地区，也正是这一时期，形成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区的。这里不妨举五代的一些建设为例：如《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说，吴越王元瓘，

“性尤奢僭，好治宫室”，在他的影响下，一时吴越的臣僚，也掀起了一股治室、建园和造园的热潮，使苏州、杭州等地妆扮一新，留下了许多胜迹。如现在杭州旅游的许多景点——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上天竺的法净寺、南屏山的净慈寺等，就都是始建于五代。此外，又如苏州的沧浪亭，最早是钱元璩建造的“南园”；环秀山庄，是五代的“金谷园”；城外的虎丘塔，也是五代末年的遗迹等。因为这样，在唐末和五代，就出现了“生东吴，死丹徒（其地宜墓）”和“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做百姓”等谚语，以致到宋时的《吴郡志》中，更正式把苏州和杭州，比喻为人间的“天堂”。

当然，在阶级社会中，如果说有什么“天堂”，那也只有和只能是剥削阶级的天堂。唐宋时，太湖地区虽然园林相竞、甲富东南，但劳动人民建造起来的园囿，是专供剥削阶级休憩游息的，劳动人民种养和织造出来的青梁嘉肴、丝绸锦帛，只有剥削阶级才能占有享用；终年胼手胝足的劳动人民，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承平年分，也只能求得一个衣稍蔽体、粗茶淡饭的勉强温饱的日子。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也是太湖地区商品农业有较大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向近代缓慢前进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太湖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农业生产不仅更趋精细、持续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农副产品中的名特优产品，成倍增长。以水稻品种为例，据研究，“明代出现的优质稻品种有24个，清代16个”，这个数字，比“唐宋时期记载的优质稻品种数（10个），整整增加了3倍。”另如这一时期著名的畜产品种有：太湖猪、湖羊、太湖鸭和浦东鸡等；著名果树品种有：塘栖枇杷、白沙枇杷、洞庭红橘、顶山栗、浦东消梅、杭州金菱杨梅、上海水蜜桃、无锡水蜜桃；著名蔬菜品种有：杭州黄芽菜、嘉兴南湖菱、苏州茭苳藕、太湖莼菜、湖州太湖萝卜、苏州茭

白、宜兴百合、嘉定橄榄瓜等。其它如茶叶、水产和花卉等，明清时的名特品种，也举不胜举。当然这些优良品种，虽然明清时称盛东南，但有些在六朝和隋唐时，便已著名和入贡，这时不过生产更多和消费的地域更加广泛而已。如杭州的金婆杨梅，宋朝就很出名，明代时，苏州卢襄羁旅北国，曾作诗叹曰：“北方地冷无南果，最恨杨梅未得尝。极目杭山凝欲下，移家聚坞未能忘”，至明朝时，仍为“与荔枝并擅高名”的“吴中佳果”。再以这一时期吴县东、西山的花果生产来说，如王鏊在其《洞庭山赋》中称：山中“遍种果实，既繁且美，……兴贩南北，远近鬻售，所谓千头木奴，可埒封君之富也。”明清果蔬园圃的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还一定地促进了专业化生产或集约程度的提高。如同治《上海县志》载：“西南近乡，园圃比连”；“南门外数十里，皆种桃为业。”万鄂的《东城杂记》和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对杭州东郊的菜园，还都提到，所种之菜，除供杭州全市需要外，还供应附近的临平、长安等镇，有的耐运品种，甚至还有远销广州等地。

要说明清商品和集约生产的发展，最突出的，还是在太湖东部沿海、沿江地区棉花生产的发展上。南宋时，棉花从岭南传播到长江流域；元朝时，上海乌泥泾一带，经黄道婆的大力倡导，很快成为太湖地区棉花生产和纺织的一个技术中心。至明清时，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在上海、嘉定、太仓、昆山等高沙地区，因为“田身高仰”，适宜种棉，不但新开垦的土地主要用来植棉，甚至原来种植水稻的很多田块，也弃稻改棉，形成了太湖沿江、沿海连片种植的专业棉区。如明人张五典在《种棉法》中指出：“上海县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指出，嘉定有些地方，“种稻之田不能什一，其民独命于木棉”。太湖地区棉农也和蚕桑生产一样，不只种花，也纺纱织布，如正德《松江府志》记载：“俗务纺织，他技不多，

而精线纩、三棱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为天下第一。”因为这样，所以其时也有“买不完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等一类谚语；变成了既是棉花也是棉纱和棉布生产的中心。当时沿江、沿海的一些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土地都用来植棉，其棉花纺织加工当然非棉区一地人民所能完全承担，因此如正德《姑苏志》所说：“苏州府属七县，邑之民业，首籍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家家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以此出”，天启《海盐图经》也称：“产地木棉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家户户习为恒业。”由上面这些来看，太湖地区的棉花生产，不只是棉区的一种商品生产，其纺纱织布，也发展形成成为全区的一种农村副业和一些城镇的主要手工业，这不仅对棉区对整个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明清太湖地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富庶，与这一时期棉业的突出发展是分不开的。

从上面所说的整个情况来看，太湖地区在唐朝以后，其经济的发展虽然是时有波折和起伏，但从总的趋势来说，还是一直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的。我国中原地区的农业，在唐朝以前，曾一度冠甲全国，但后来日渐衰落了。那么，太湖地区的农业，为什么在唐朝领先全国以后，长期持盛不衰呢？我们认为，这从农业生产的条件上说，主要是其较好地解决了这样三个问题：

（一）注意水利建设，较好地解决了洪涝灾害。太湖地区自然条件虽然优越，但也不是没有不足，如其地势特别是沿海、沿湖地区，比较低洼，加之雨量集中，所以，历史上常常出现洪涝和海浸等灾害，这也是唐以前这一地区农业所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唐开元元年（713），在盐官首先修筑了一条长约124里“捍海塘堤”，有效地拦截了大片土地的潮汐浸渍，使嘉兴和上海一部分土地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元和五年（810），又沿太湖东缘修筑了一条“吴江塘路”，在太湖东部建起了一道湖堤，使过去常遭水淹

而未加开发的一片低地变成了农区。五代钱鏐时，在唐代水利的基础上，又大加发展、建设，使太湖平原地区，大部分都变成了“五里或七里一纵浦，七里或十里一横塘”的完整的塘浦圩田体系。这也就是说，太湖地区经唐朝特别是五代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上修起了一批旱涝保收和比较高产、稳产的农田。所以，在宋朝以后，太湖地区的农田水利，主要集中在疏浚下游河道和修治圩田这两个方面。如元代，水利的重点是浚治吴淞江和淀泖湖水系，以疏导苏州、松江、嘉兴地区的积水。明清在继续浚治吴淞江等下游河道的同时，在圩田治理上，则创造出了分区、分片控制治理的办法。即按照地势的高低，将圩田分成高厍、中厍和下厍三等，分别修筑厍岸，使其各成一个独立区段，“外沟以受高地之水，使不内浸，内堤以卫低田之稼，俾免外入”；这样，就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收到了“旱涝有救，高下俱熟”的效果。

(二) 重视积肥施肥，保证地力常新。唐代以后，太湖地区由过去的“地广人稀”，一变成成为“人稠地狭”的地区，可资开发的土地愈来愈少，农业的产量，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途径来解决。但是，“地久耕则耗”，陈旉在其《农书》中也说：“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为防止地力衰退和提高土地的肥力，在太湖地区，就把增施肥料，提高到农业生产的一个突出地位。如陈旉《农书》中说，对地力出现衰退的土地，“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散何衰之有？”王桢《农书》也说：“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散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这些，都反映宋元时，太湖一带对培养地力和增施肥料的重视。到明清时，这一地区对肥料特别是猪粪、羊粪和河泥的积贮、使用，更加重视。如《沈氏农书》中称：“种田地，肥壅最为要紧，……古人云：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须成功，则养猪羊乃作家第

一著。”又称：“古人云，家不兴，少心齐；桑不兴，少河泥；需泥第一紧要事。”《浦柳农咨》中也说：“棚中猪多，囤中米多，是养猪乃种田之要务也。”唐宋以后，太湖地区重视积肥施肥的结果，是使这一地区的产量愈种愈高，土地愈种愈肥。这一点，如《群书考索》所分析：“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吴越闽蜀者，古扬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贡》……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养灌溉之功至也。”

（三）适应社会和生产发展需要，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的内容和与其他经济的联系。唐朝以前，太湖地区农业和经济的开发，主要依靠和表现在土地的垦拓上。唐朝以后，太湖地区土地已基本被开垦，随人口的不断增加，这时太湖地区的农业，其重点就从耕地的增拓，转移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来了。至明清时，更从以粮食生产为主的格局，转变到以发展经济作物和加工业为主；鸦片战争以后，更从单纯的手工劳动，开始转变为机械和半机械生产的发展。这每一次转变或发展，都促使和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农业，更加在广度和深度上向前又发展迈进了一步。清代奚诚在《耕心农话》中说：“盖夫晴雨者，天道之常情也；崎岖者，地理之形势也；丰俭虽云岁时，实系人工之工拙也。故君子贵于思患而预防，在乎变通制宜，以人巧可代天工也。所以天时不如地理，地理不如人事焉。”奚诚的这段话，道出了太湖地区农业在唐朝以后长期兴旺发达、盛而不衰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说，太湖地区的自然环境是天赋的，而太湖地区后来农业和经济的繁荣，则完全是人为的，是太湖地区劳动人民世代代殷辛劳动、创造的结晶。

太湖地区的先民，呕心沥血，为我们创建了一个极其繁荣、美丽和富饶的经济区域。但倾古代千百年来的成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四十年来建设相比，就显得又较渺小了。不过，近四

十年来的太湖地区农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是，如果与世界先进水平和现代化农业的要求相比，则又显得十分不够了。现在，太湖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正在积极进行着一场深刻的现代化建设；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所谓中国的“特色”或“特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主要是历史形成的一些内容。鉴于这样一些情况，我们虽然实际上远远没有做到，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编写的这部《太湖地区农业史稿》，能够为太湖地区乃至全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或参考。最后再顺便声明一句，本书各章的撰稿人，虽然都是我室研究这方面内容的行家，但限于时间匆促，都只是作了些浮光掠影的介绍，说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这是要向大家附致歉意的。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地理环境和农业发展概略.....	1
第一节 自然条件	1
第二节 社会经济条件	9
第三节 农业发展概说	19
第二章 太湖地区水利的建设和治理.....	46
第一节 先秦水利	46
第二节 秦汉六朝水利的开发	50
第三节 隋唐五代水利的发展	56
第四节 宋元时的太湖水利治理	65
第五节 明清太湖水利的整治	79
第三章 以水稻为核心的粮食生产的发展	93
第一节 史前的粮食生产	93
第二节 先秦至六朝的粮食生产	98
第三节 隋唐五代的粮食生产	101
第四节 宋元时期的粮食生产	104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	112
第四章 麻 葛 棉 花 和 油菜生产的演变与发展	135
第一节 麻葛栽培的兴衰	135
第二节 油菜生产的发展	146
第三节 迅速盛起的太湖棉业	153
第五章 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蚕桑业	170
第一节 唐朝以前太湖地区蚕桑业的缓慢发展	170
第二节 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后的太湖蚕桑业	175
第三节 棉花传入江南后的太湖地区蚕桑业	178

第四节	鸦片战争后进一步繁荣的太湖地区蚕桑业	135
第五节	太湖地区的古代蚕书和蚕桑技术述要	132
第六节	蚕桑生产和太湖地区的农村经济	202
第六章	太湖茶叶名著全国	206
第一节	茶业的起源和六朝前的茶业	206
第二节	唐朝紫笋和阳羨的独步天下	211
第三节	宋元太湖地区的茶叶改制	216
第四节	龙井和碧螺春的名甲天下	222
第七章	果树栽培简史	230
第一节	南北朝以前的果树栽培情况	230
第二节	隋唐五代柑橘类果树的迅速发展	233
第三节	宋元时期各类果树的全面发展	237
第四节	明清太湖地区柑橘栽培的衰落和枇杷、杨梅与桃的显著发展	243
第八章	蔬菜栽培简史	258
第一节	秦汉以前的蔬菜栽培	258
第二节	三国至五代时期的蔬菜栽培	260
第三节	宋元时期蔬菜栽培的迅速发展	266
第四节	明清太湖地区蔬菜栽培的持续发展	272
第九章	名甲天下的太湖花卉和园林	285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花卉种植与园林	285
第二节	五代和两宋的园林与花卉栽培	293
第三节	明清太湖地区园林的发展	302
第四节	明清太湖地区的花卉栽培与技术	310
第十章	太湖地区平原林业的发展	322
第一节	先秦林事概述	323
第二节	秦汉和六朝的林业	331
第三节	隋唐五代林业的发展	336
第四节	宋元圩田和城市绿化的发展	340
第五节	明清林业和后湖山林的破坏	343
第十一章	与农业有机结合的畜牧业	352
第一节	先秦畜牧掠影	352
第二节	秦汉和六朝时期的畜牧业	360